

政 治

# 后苏联空间国家的政治 — 法律设计

## —— 从后苏联空间政权合法化到国家规划探索

[俄] 马·维利索夫 陈晓棠 译

【内容提要】苏联解体后，在后苏联空间国家突然拥有国家主权的条件下，新政治精英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法律制度。对这些国家而言，设计与现实相适应的政治—法律制度、建立稳定的国家体制、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国家政策的过程过于拖延，前景令人质疑，而且即将面临政治代际更替的全新挑战。后苏联空间非常复杂，但也因此是研究和政治设计的重要地区。20 多年的实践表明，不应期待后苏联空间的快速转型。大多数后苏联空间国家未完成国家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使形势复杂化，可能导致巨大的变数，包括冲突和诉诸武力。但是，外部环境仍逼迫变革。对于后苏联空间国家而言，变革具有政治理性化和政治制度形式化的目的，包括以法律形式固定政治制度和强制政治设计者更多地在正式法律范围内行事，而达到上述目的的选择包括革命性变革或“自上而下的革命”。

【关键词】后苏联空间国家 战略规划 政治精英  
新世袭制度

【中图分类号】D73/77.5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1094 (2020) 02-0056-0014

【作者简介】马·维利索夫 (Максим Вилисов)，政治学副博士，莫斯科国立大学政治学系国家政策教研室主任。

【译者简介】陈晓棠，法学博士，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副教授。

## 一、主要研究任务

苏联不复存在已 20 多年，后苏联空间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国家，这种变化不仅改变了世界政治版图，而且改变了国际政治进程。苏联意外地迅速解体令专家、政治家和政治精英措手不及。他们不仅来不及采取一些理性的政治行动，甚至没能在一定程度上深入思考这一过程，包括学术性思考。直到 20 多年以后，俄罗斯和西方国家围绕乌克兰危机陷入紧张对峙时，人们才认识到西方和俄罗斯统治集团对苏联解体过程评价差异的巨大程度以及这些评价影响当代政治进程的深刻程度。

应当说，后苏联空间国家独立后，精英们不得不完成非常复杂的任务——他们需要构建新的政治和法律空间，设计新国家体制的发展蓝图。极其异常的条件对取得的结果产生重大影响。自苏联解体已经过去相当于代际更替，包括政治代际更替周期的时间。现在可以肯定地说，后苏联空间的政治转型过程远未结束。这些国家继续探索、构建和实施政治和国家建设规划，这些过程至今仍时而伴随着深刻的政治和社会动荡：革命、武装冲突以及痛苦的改革。尽管后苏联空间国家极力试图疏远彼此，展示本国政治规划的独特性和独立性，但其政治进程仍具有来源于苏联历史的共同基础。A. 列杰涅娃恰如其分地指出，苏联时期同一“酒桶里”的“发酵”过程至今仍然决定着后苏联空间政治进程和政治制度的“味道”<sup>①</sup>。

总体而言，后苏联空间国家的政治 - 法律设计指的是，借助于法律手段实施（并以法律形式巩固下来）的有意识、有目的革新政治进程和政治制度的活动。完成这项活动的一个具体举措是政治 - 法律规划，后者在此是指以法律形式设计、实施和确定政治 - 行政改革，结果是建立和（或）调整政治进程和政治制度。类似非常宽泛的定义有助于进行全方位政治研究：从国内层面（中央、地区、地方）到国际层面（区域、全球）。通过研究官方法规或政治 - 法律文献，将政治和法律要素一并列入研究对象，一定程度上简化了筛选和分析原始资料的任务。这种方法实际上为在更广泛的学科领域开展研究提供了可能性。部分学者认为这是俄罗斯政治科学作为“跨学科矩阵”的现代发展趋势，其基础是政治学、国际关系

---

<sup>①</sup> Ledeneva A. Can Russia Modernise? Sistema, Power Networks and Informal Governance. -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17.

和区域研究相结合<sup>①</sup>。这种方法还可以借助邻近的法律学科,克服由学科日益分化和“专门化”<sup>②</sup>而导致的知识碎片化缺点,以及研究政治法律文献文本,为运用更多样化的方法论工具创造可能。

目前对后苏联空间国家制定和实施国家政策的特点认识不足,限制了后苏联空间实施一体化计划和倡议的前景,也妨碍了这些国家在世界全球化进程中确立适当的位置。世界正进入时而被称为“达沃斯恐慌”<sup>③</sup>、时而被称为“旧世界秩序终结”<sup>④</sup>的重大而紧张的变革时期。

## 二、政治规划和设计

长期以来,政治规划和政治设计一直是俄罗斯政治学关注的焦点<sup>⑤</sup>。近来无论从理论角度还是从实践角度,人们对国家政策和国家治理规划的兴趣增加。

实践上值得一提的是,俄联邦政府活动框架内项目管理法实现形式化和制度化<sup>⑥</sup>。这一方面反映出探索提高国家治理效率的需求,另一方面也说明制定和实施国家政策过程中应用项目管理法确实具有优势。由于不长于以政治方式制定统一、不相互矛盾的议事日程,俄罗斯当局试图通过行政任命完成这项任务。如此不仅能够最低限度地规划和实施当前的国家治理活动,而且可以在人员和制度方面改造政治-行政生态。这里不详细研究俄罗斯紧迫的政治现实中项目管理法的特点,仅强调其已为 10 余年各种项目(优先项目、国家项目和类似项目)实践所证明的巨大应用需求。

理论上值得一提的是,2016 年出版了一部尝试全面思考政治设计活动的著

---

① Гаман-Голутвина О. В. Политология как метадисциплинарная матрица //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процессы. 2016. Т. 4. № 1.

② Ильин М. В. Методологический вызов. Что делает науку единой? Как соединить разъединенные сферы познания? // Метод: Московский ежегодник трудов из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дисциплин. М., 2014. Вып. 4. С. 6-11.

③ Копелевич И. Чубайс: «Мир перевернулся. Такой ужас в Давосе я припомню только раз». <https://www.bfm.ru/news/344362>

④ Дивеева Ю. Штайнмайер назвал избрание Трампа «концом прежнего миропорядка». <http://www.kp.ru/online/news/2633503/>

⑤ Симонов К. В.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анализ. М., 2002. С. 150.

⑥ Вилисов М. 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проектный подход //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наука. 2016. Специальный выпуск.

作<sup>①</sup>。书中非常详细地剖析了描述政治规划相关活动的概念工具，厘清“规划”和“设计”两个概念之间的关系，这对于本研究非常重要。特别是部分作者提出，政治设计的一般定义是指“一个或若干个体或组织设立和制定政治规划的活动”<sup>②</sup>。一些作者建议将政治规划视为“根据既定政治目标，创建新政治客体或调整既有政治客体和（或）政治客体之间关系的文件或文件总和”<sup>③</sup>。类似观点论据充足，包括引用管理学的项目管理活动实践。鉴于上述俄罗斯执行机构的项目管理活动，这种认识政治规划和政治设计的方法尤显正确。

为了支持和发展这种方法，我们将政治规划和政治设计的研究对象具体到政治 – 法律维度。在这种情况下，固定政治规划的法律文件是指规范性法律文件（立法机关颁布的各种法律、法律许可范围内的命令）、条约法律文件（国际条约、联邦条约、其他类似条约）、司法机构法律文书和政治 – 法律文件（不久前俄罗斯司法体系中作为战略规划文件以立法形式固定下来的政治性法律文件<sup>④</sup>）。按照俄罗斯法律，在联邦、联邦主体和自治机构不同层面目标定向、预测、规划和设计框架内制定的文件属于这类文件，包括总统致联邦会议咨文、战略、预测、纲要和其他文件<sup>⑤</sup>。早有必要将类似文件（的确，冠之以大类概念“学说”而非“战略”，俄罗斯立法有过这样的实践）纳入法律体系，可是有关法律的通过过程充满矛盾和冲突<sup>⑥</sup>。不过这一事实是独特的先例，能更加准确地确定作为研究对象的政治 – 法律文件。

这样，相关文件具有法律地位决定了在更宏大的政治规划框架内政治 – 法律规划的研究特点。这一特性非常重要，因为它赋予某些政治观点或立场以应用的合法性和强制性，在某些情况下有助于提高政治观点或立场的合法性，有时甚至在损害更温和但更复杂的政治机制的情况下，直接“强制”使国家确立的目标合

---

①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роектирование: глобальн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измерения / Под ред. М. Н. Грачева и Н. А. Борисова. М.: Мир философии, 2016. С. 464 .

② Там же. С. 11.

③ Там же. С. 12.

④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8 июня 2014 г. N 172-ФЗ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планировании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7 мая 2012 г. N 19 С. 2333.

⑤ Там же.

⑥ Вилисов М. В. Роль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планировании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 Власть. 2016. № 6.

法化<sup>①</sup>。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 - 法律设计日益活跃预示政治进程复杂、缺少对话和沟通、不乏斗争和暴力转向政治 - 法律设计。将法律要素纳入研究范畴使研究的经验基础具体化，从而能够利用政治进程结果的文件内容和对文件进行修改的情况，准确记载复杂政治进程。

在项目管理法框架内同样可能使影响政治 - 法律设计的客体具体化：这不是简单地“创建新政治客体或调整既有政治客体和（或）政治客体之间关系……”<sup>②</sup>，而是影响具体的进程和制度，既包括公开的、正式的进程和制度，也包括非公开的、非正式的进程和制度。这里蕴含着政治 - 法律设计的重要二重性：一方面，运用法律要素设计政治进程和政治制度似乎明显致力于关系的合理化和正式调整，以此降低非公开、非正式机制的影响；另一方面，政治 - 法律设计反过来也能够刺激非正式制度和进程的活跃性以补偿正式制度和进程的低效，例如苏联时期的“走后门”<sup>③</sup>、非正式网络<sup>④</sup>和当前的腐败<sup>⑤</sup>等现象。

认识政治 - 法律设计的特点能让我们更有效地加以运用，包括用于研究后苏联空间的复杂政治进程。从分析政治法律文件开始最合适。

### 三、宪法建设

后苏联空间国家确立独立国家制度的进程伴随着政治和法律领域的巨大变化，主要表现为两个趋势：放弃苏联遗产（去苏联化）和探索新的替代形式。新独立国家宪法的制定是展开这些进程的重要舞台。从政治 - 法律设计角度看，宪法是当代世界规定重要政治制度和政治进程、宣告国家政策原则和目的的主要文件，是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名片”。

后苏联空间国家被迫紧急转入自主制定宪法，因为取代联盟制度的独联体主

① Соловьев А.И. Право и политика как механизмы легитимац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проектов / Признание права и принцип формального равенства. Сборник трудов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й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М.: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право, 2015. С. 23-34.

②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роектирование: глобальн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измерения / Под ред. М.Н. Грачева и Н.А. Борисова. С. 12.

③ Ledeneva A. Russia's economy of Favours: Blat, Networking and Informal Exchan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④ Ledeneva A. Can Russia Modernise? Sistema, Power Networks and Informal Governanc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⑤ Барсукова С., Леденева А. От глобальной коррупционной парадигмы к изучению неформальных практик: различие в подходах аутсайдеров и инсайдеров // 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 No 2, 2014.

要行使协调职能<sup>①</sup>。

这一过程进展不快，从1992年一直持续到1995年。

对于声明希望尽快融入国际社会的后苏联空间国家来说，其宪法的共同点是各国立法执行公认的国际法准则和独联体普通法<sup>②</sup>。《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66年）、《赫尔辛基最后文件》（1978年）、《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最后文件》（1976年）、《关于各国依联合国宪章建立友好关系及合作之国际法原则之宣言》（1970年）构成这些文件的基础<sup>③</sup>。结果，从宪法宣称的原则和宪法制度的基础看，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宪法非常相似：新国家是政体形式和国家制度各不相同的民主化、世俗化、社会性和法治化国家。这总体符合当时的社会情绪和政治期待。

这样，后苏联空间国家宪法确定内政外交基本发展框架，从法律意义上完成了从苏联到后苏联的过渡，履行了政治—法律设计职能。从政治—法律设计角度看，新宪法基本上使用非常一致的宣言性表述，以法律形式把广大民众向“民主”“新经济模式”过渡的期待固定下来。正是向广大民众寻求支持和合法化，基本决定了宪法以公投方式获得通过。在这种情况下，全民公决是确定结果，常常也是克服精英内部分裂的最有效手段。

应当说，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宪法基本上成功地履行了保障社会制度和国体合法化的职能<sup>④</sup>，也意味着确立了今后政治发展和“超级政治规划”的框架。通常由于革命和内战才对宪法做出重大修改，精英内部基本同意小幅修改宪法（延长国家元首任期和/或取消连任次数限制）以维护统治制度的稳定。这种情况发生的背景是，一些专家指出世界范围内修宪实践总体呈上升趋势。虽然如此，评价修宪必须考虑到宪法本身以及宪法模式的不同特点<sup>⑤</sup>，而这不属于本研究的范畴。

#### 四、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设计

通过确立宪法框架制定“超级政治规划”奠定了后苏联空间国家主权国家体

① Новые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стран СНГ и Балтии.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Вып. 2. М.: Манускрипт, 1997.

② Там же.

③ Там же.

④ Хабриева Т. Я.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ая реформа в современном мире. М.: Наука РАН, 2016. С. 8-9.

⑤ Там же. С. 41-43.

制的基础。后苏联空间国家的精英们迫切需要进一步推进政策和政治-法律设计。这一过程自然受到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因素的影响。全球层面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全球化（表现多样，包括所谓的“大趋势”）<sup>①</sup>和区域化（包括后苏联空间的一体化和非一体化），国家层面则首先取决于设计主体，即最活跃的政治行动者的特征（这种情况下指的是精英的特征）。

全球因素的影响首先体现于政治“民主化”和经济“自由化”计划的实施。当初根据后苏联空间国家宪法确立的政治制度，应当经过实践检验并获得外界积极评价。实际上这里指的是，后苏联空间国家融入“冷战后”世界的过程。对这一过程的主观评价决定了国家和精英的自我认同<sup>②</sup>。数十年后人们发现，不同国家的主观评价存在显著差异。一些学者认为，主要区别在于俄罗斯继续视自己为“强国”，有权获得西方国家的承认和拥有“特权利益”，特别是在后苏联空间<sup>③</sup>。另一些学者则认为，主要区别在于各方对“冷战”终结的评价分歧巨大。美国精英认为这是他们的胜利，确定了俄罗斯在“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中的从属地位；俄罗斯精英则认为这是大国“冷战”正式结束对抗后从未停息的反俄运动的非法尝试<sup>④</sup>。这一主要矛盾能够解释制定和评价后苏联空间区域规划时的很多问题。俄罗斯重新整合后苏联空间和谋求“特权利益”的尝试，遭遇西方国家以及政治制度得到西方国家支持的邻国的抵制，这促使俄罗斯迅速在民主化问题以外将国家安全问题列入政治设计日程。国家安全问题后来成为俄罗斯制定战略规划政治-法律制度的“火车头”。

民主建设本身，特别是在后苏联空间“颜色革命”蔓延的背景下，被视为对主权和国家安全的威胁<sup>⑤</sup>，这在之后的《俄罗斯联邦国家安全战略》中有所体现<sup>⑥</sup>。一体化计划——欧亚经济联盟、欧盟和北约扩张的冲突为乌克兰危机的发展创造了先决条件。应当指出，作为一体化计划，欧亚经济联盟的产生不仅仅

①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проектирование: глобальное,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региональное измерения / Под ред. М. Н. Грачева и Н. А. Борисова. С. 24-27.

② Sakwa R. Russia's Identity: Between the "Domestic" and the "International" // Europe-Asia Studies. 2011. Vol. 63 Issue 6. p. 957.

③ Ibid. pp. 957-958.

④ Lukyanov, Fyodor. Putin's Foreign Policy // Foreign Policy. 2016. vol. 95. Issue 3. p. 31.

⑤ Sakwa R. Russia's Identity: Between the "Domestic" and the "International" // Europe-Asia Studies. 2011. Vol. 63 Issue 6. p. 962.

⑥ Указ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2 мая 2009 г. N 537 "О Стратег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до 2020 года" //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18 мая 2009 г. N 20 С. 2444.

源于俄罗斯的倡议，也得到哈萨克斯坦的大力支持，并且完全出于务实和理性考虑<sup>①</sup>。结果，这项毋庸置疑属于政治规划的区域一体化计划借助一系列国际条约——首先是建立关税同盟，然后是建立欧亚经济联盟，以具体的国际法形式确定下来。

启动乌克兰加入欧亚经济联盟谈判的决议获得通过，成为2013年抗议活动的正式理由。2014年初，这场抗议活动以乌克兰政局变动和选举出拥护欧洲一体化的新政府宣告结束。这样，区域一体化计划在后苏联空间政治 - 法律设计中发挥了并将继续发挥重要作用。近年来，区域一体化计划的数量不断增加，而且不再将后苏联空间仅作为俄罗斯与西方的竞争场。例如，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同样将后苏联空间视为实现和推进中国自身利益的地区，借鉴“丝绸之路”丰富的历史经验，在确保中国领导地位的条件下，提出非常务实的经济合作模式<sup>②</sup>。当然，这项倡议的实施会在低强度冲突环境下进行。中俄就“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和欧亚经济联盟建设对接达成一致是两国关系的重大突破。但是，这不能消除而只会强化欧亚地区政治规划的竞争。在这一背景下，俄方不久前提出的试图“整合一体化计划”的“大欧亚”构想可能具有一定前景，虽然目前尚未得到西方的热烈回应。

应当公正地指出，后苏联空间国家本身目前对任何一体化计划都态度冷淡，表面上和实际上均奉行“多向性”外交政策。这既涉及后苏联时期传统上变化无常的乌克兰和中亚国家的政治制度——对这些国家而言，“多向性”变成利用外部力量中心的矛盾为自身谋取各种利益的博弈<sup>③</sup>，也涉及俄罗斯的主要盟友和伙伴白俄罗斯——为达到战术性的政治利益，这个国家同样准备周期性地显著修订俄白战略伙伴方针的意图<sup>④</sup>。对于中亚政治制度来说，一体化计划多半被视为在强大外部因素——西方及其民主化和伊斯兰教教义的压力下，不断寻求平衡和稳定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恶”。作为共产主义官僚政治的继承人，这些制度不得

① Hale, Henry E. Cause without a Rebel: Kazakhstan's Unionist Nationalism in the USSR and CIS // Nationalities Papers, 2009. 37:1, p. 24.

② 中国全球项目对欧亚：任务设定（分析性报告）。M.: 科学专家，2016。C. 7 / Сайт Центра изучения кризис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 <http://centero.ru/wp-content/uploads/2016/11/111-avtor-logo-CHINA2-01.pdf>

③ 从土库斯坦到中亚：政治未来。编。A. A. Кривопапов。M.: 科学专家，2016。C. 82.

④ 白俄罗斯“ Maidan”是否可能：诊断和俄罗斯的挑战。M.: 科学专家，2016。C. 107.



不利用苏联时期提出的参数构建自我认同，践行“从共产主义者到民族主义者”的概念<sup>①</sup>。因此，参加俄罗斯一体化计划是一场“有所贪图的婚姻”，主要目的只有一个——保障本国主权和国内政治稳定。

这里隐藏着巨大的非一体化潜力：后苏联空间国家的国家规划论证不过是某种形式的民族主义。一个国家与俄罗斯的文化、历史和经济联系越紧密，这种民族主义的反俄倾向越明显。乌克兰和近几年西方国家参与其中的持续危机就是典型例子。乌克兰新领导层断绝与俄罗斯的关系，这种从经济角度看完全不务实的举动有着深刻的内在原因——与乌克兰精英担心失去政权和影响力有关。在这种情况下，欧洲一体化计划只是引力中心，并非实际运行方向。真正的运行方向始终只有一个：在相应地区保持政权，依靠政权获取经济监督和资源再分配的机会。

后苏联空间国家的民主建设亦是如此。研究人员早已注意到一种趋势——将后苏联空间国家政治制度视为集民主“面孔”与独裁主义于一身的“混合体制”，通常根据总体特点把这些制度归为新世袭制度。与利用“民主输送”理论概念简单评价某种政治制度的“民主性”程度相比，新世袭制度为更深入地研究政治现象提供可能<sup>②</sup>。研究人员指出后苏联空间国家（波罗的海国家除外）引进民主进程的一个重要特点：国家建设过程和法制、“理性”国家建设过程在时间上一致，其他发展中国家（例如拉丁美洲、东欧国家）没出现过这种情况<sup>③</sup>。结果，两个过程都未完成：后苏联空间国家既未成为现代民族国家，也未建立起现代理性官僚体制和法律秩序。作为补偿机制，为弥补未完成建设过程的不足，后苏联空间国家开始广泛应用不同形式的新世袭制度实践（从中亚的苏丹制度<sup>④</sup>到广为流行的非正式隐性政治网络和实践）。实践的本质只有一个：使政治民主的正式制度适应新世袭制度实践的现实逻辑，并在此基础上运行整个政治体系<sup>⑤</sup>。

这些进程发展的结果是：

1. 形成利用不同政治 - 经济工具组合达到政治目的的商人和官僚政治阶层。
2. 政治精英攫取公共（政治、行政和国家）资源和工具，其中包括为了同反

① Лаумулин М. Т. К вопросу о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в Средней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 Контуры глобальных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политика, экономика, право. 2016. вып. 5. том. 9. С. 97.

② Fisun O. Rethinking Post-Soviet Politics from a Neopatrimonial Perspective // Demokratizatsiya The Journal of Post-Soviet Democratization. 20(2):87-96.

③ Ibid. pp. 89-90.

④ От Туркестана к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будущее региона. Отв. ред. А. А. Кривопапов. М.: Научный эксперт, 2016. С. 17-18.

⑤ Fisun O. Rethinking Post-Soviet Politics from a Neopatrimonial Perspective.

对派进行政治斗争动用公共资源和工具。

3. 非正式的老板 - 客户关系对确立政治 - 经济进程发挥决定性作用<sup>①</sup>。

在类似条件下，由于非正式关系和非正式网络的高度竞争力，政治 - 法律设计遭遇困境，政治设计本身仅限于解决权力争斗的战术性问题。因此，部分研究人员建议利用精英理论研究后苏联空间政治生态的特点<sup>②</sup>。II. 鲁特兰指出，20世纪90年代后苏联空间国家精英就已经“掌控政治空间和保障选举结果，在选举中从程序角度保持了民主的可视性”<sup>③</sup>。后苏联空间转型过程中精英组成和结构发生变化，正式和非正式制度出现调整，包括苏联时期传承下来的正式和非正式制度，但具有重要意义的主要社会规则保留下来：非正式机制和制度（关系、走后门）作用大、对法律缺乏足够尊重和政治异化<sup>④</sup>。

现实政治变成精英集团之间潜在竞争的空间。在政治关注度普遍较低背景下，制定统一且详细的国家议事日程困难重重。当时为确保政权与民众政治理想相适应<sup>⑤</sup>，精英们被迫在明确划定的设计走廊内（内部稳定、应有的生活水平、应有的国家地缘政治地位等）行动，导致公共政策方面出现民粹主义式竞争，甚至反对派候选人也未能提出切合实际的政治替代方案、一定程度上清晰易懂的纲领和（或）议事日程<sup>⑥</sup>。在这种条件下，领导人更迭多半不会改变任何事情，需要真正的政治体制变革。

在既有形势下，常常以国家名义行事的政治精英成为变革的主要推动者、政治规划的设计者和执行者。政治规划由政治 - 行政部门制定，借助法律机制（获得政治 - 行政制度特征）合法化，在复杂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系与实践空间内实施，保障相对较低，但这是在当前政治环境下精英可以接受的治理效率<sup>⑦</sup>。

政治合理性是后苏联空间变革最重要的推动力。战略规划过程越来越形式化成为近年俄罗斯政治的发展趋势：国家的主要战略利益一经确定和宣布，就立即着手实施。在一定程度上这与乌克兰危机导致的俄罗斯与西方冲突有关——危机

① Fisun O. Rethinking Post-Soviet Politics from a Neopatrimonial Perspective.

② Рапленд П.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е элиты России // Полис. 2016. № 3. С. 55-72.

③ Там же. С. 63.

④ Там же. С. 60.

⑤ Lukin A. Russia's New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Post-Soviet Political Ideal // Post-Soviet Affairs. 2009. 25:1. p 78.

⑥ JussiLassila (2016) Aleksei Naval'nyi and Populist Re-ordering of Putin's Stability, Europe-Asia Studies, 68:1, 118-137, p 13-135.

⑦ Andrei Melville & Mikhail Mironyuk (2016) "Bad enough governance": state capacity and quality of institutions in post-Soviet autocracies, Post-Soviet Affairs, 32:2, 132-151.

极大地提高了动员对抗条件下对国家治理效率的要求。

作为政治和国家治理活动，后苏联空间的战略规划刚刚开始制度化。在后苏联空间国家体制形成初期，规划本身常常被视为苏联指令性计划体制的残余，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没有存在必要，遭到自由派政治势力的激烈抵制。1995 年俄联邦出台经济社会发展预测和规划制度，并以相应法律固定下来是妥协的结果<sup>①</sup>。这项法律主要适用于经济社会发展预测<sup>②</sup>。白俄罗斯<sup>③</sup>和乌克兰<sup>④</sup>也分别于 1998 年和 2000 年通过类似法律。20 世纪 90 年代的总体特征是国家政治发展规划非常混乱，仅限于通过零散的政治文件（构想、政策基础、学说）或财政预算文件（纲要）。这些文件之间联系较弱，缺乏协调一致的目标以及效率评价和政治责任划分机制。不过，经济社会发展的消极后果、1998 年俄罗斯经济危机以及由改革失望情绪引发的政治需求<sup>⑤</sup>再度令人们关注国家政治设计和规划。

目前俄罗斯的战略规划受法律调整，并且作为一项政治 - 法律制度确定下来。遗憾的是，战略规划尚未发挥应有的作用，逊色于其他形式的政治 - 法律设计。但是总体而言，可以认为这种方法的实践性尝试是试图构建 O. 菲孙的“新官僚世袭制”<sup>⑥</sup>理性治理模式。新官僚世袭制看来是现阶段后苏联空间政治体制转型最现实的方式。

## 结语

后苏联空间非常复杂，但也因此是研究和政治设计的重要地区。

分析的复杂性与错误及误解有关。错误和误解主要在于试图通过“民主化”“民

① Федеральный закон от 20 июля 1995 г. N 115-ФЗ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м прогнозировании и программах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Собрание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24 июля 1995 г. N 30, ст. 2871.

② Вилисов М. В. Роль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о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м планировании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 Власть. 2016. № 6.

③ Аналитический доклад «Анализ систем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ланирования Республики Беларусь,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 Евразийская эконом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Департамент макр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М., 2014. [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act/integr\\_i\\_makroec/dep\\_makroec\\_pol/investigations/Documents/Доклад%20по%20системам%20страт%20планирования%2012.12.2014.pdf](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ru/act/integr_i_makroec/dep_makroec_pol/investigations/Documents/Доклад%20по%20системам%20страт%20планирования%2012.12.2014.pdf)

④ Исаева Н.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систем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го планирования в Украине: проблемы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 Состояние и перспективы развития экономики (миров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региональной). Коллективная монография в 2-х книгах. Одесса, 2015. Книга 2. С. 102-117. <http://www.sworld.com.ua/simpoz4/21.pdf>

⑤ Lukin A. Russia's New Authoritarianism and the Post-Soviet Political Ideal // Post-Soviet Affairs. 2009. 25:1. С. 67, 73-75.

⑥ Fisun O. Rethinking Post-Soviet Politics from a Neopatrimonial Perspective.

主输送”和“混合政治制度”，将后苏联空间的政治进程与类似进程相比较。这种方法只能确认某些事实，认定某种制度“独裁”，预见性地走上必须进行“民主转型”设计的通常轨道。20多年的实践表明，不应期待后苏联空间的快速转型。今天的乌克兰再次证明了这一点。目前对后苏联空间政治特点的认识明显不足：应当研究非正式制度和实践、后苏联空间政治经济学的特殊性、民众和精英的价值取向和偏好、国家精英对区域和全球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认知，以及后苏联空间国家及其精英的自我认同。

大多数后苏联空间国家未完成国家建设和制度建设，这使形势复杂化，可能导致巨大的潜在变数，包括冲突和诉诸武力。即将到来的政治代际更替同样是风险因素，更不用说由于英国脱欧的意外政治决定、美国新总统行政团队就位等不确定性，国际政治空间已经湍流涌动。在这种情况下，后苏联空间政治制度的变异和适应将利大于弊。

但是，外部环境仍逼迫变革。对于后苏联空间国家而言，变革具有一个目的：政治理性和政治制度形式化，包括以法律形式固定政治制度和强制政治设计者更多地在正式法律范围内行事。达到这一目的有两个选择：革命性变革（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的发展道路）或者“自上而下的革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方案）。

（责任编辑 李淑华）

## **Политико-правовое проектирование в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государствах: от легитимизации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 к поискам 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проектов**

М. Вилисов, пер. Чэнь Сяотан

**【Аннотация】** После распада СССР, в условиях неожиданно возникшего суверенитета, новым политическим элитам нужно было формировать ново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и правов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Для многих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стран процесс политико-правового проектирования адекватных реалиям институто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устойчив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сти, разработки и реализации эффективно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политики слишком затянулся, ставя под сомнение их будущее. Новым вызовом для них в настоящее время является грядущая смена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поколений.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е пространство очень сложное, но оно также является важной областью дл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проектирования. Как показала двадцатипятилетняя практика, ожидать быстрого перехода к новым формам нельзя. В большинстве постсоветских стран еще не завершилось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 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ое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о, что осложняет ситуацию и предполагает большую вероятность изменчивости, в том числе конфликтной и с применением силы. Однако, внешние обстоятельства принуждают к изменениям. Для стран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цель изменений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рационализации политики и формализации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институтов, в том числе через их правовое закрепление и принужд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авторов к действиям преимущественно в формально-правовом поле,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остаются две альтернативы достижения цели: либо через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е изменения, либо через "революции сверху".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траны пост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стратегическое планирова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элиты; неопатримониализм

## **The Politico-Legal Design of the Post-Soviet Space State: From the Legalization of the Post-Soviet Space Regime to the Exploration of State Planning**

Maksim Vilisov, Translated by Chen Xiaotang

**Abstract:** After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the new political elite needed to establish a new political-legal space under the condition of sudden national sovereignty. For most post-Soviet space states, the process of designing a political-legal system in line with reality, establishing stable state institutions and formulating and implementing effective state policies has been too protracted and its prospects are questionable. The political generational shift now looming is a new challenge for these countries. The post-Soviet space is very complex, but it is therefore an important area for research and political design. More than 20 years of practice have shown that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the post-Soviet space should not be expected. Most of the post-Soviet space states have not completed nation-building and institution-building, which complicates the situation and could lead to huge uncertainties, including conflict and recourse to force. But the external environment still forces change. For the post-Soviet space states, the change has the purpose of political rationalization and formalized political system, including fixing the political system in the form of law and forcing the political designer to act more within the scope of formal law, and the options to achieve the purpose include revolutionary change or "top-down revolution".

**Keywords:** post-Soviet space; state strategic planning; political elite; new hereditary system